

民粹观念在今天相当弥漫,并不需要很突出的代表。无须代表,这恰恰说明它已成为一种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基本氛围。我们都受这种气氛左右,都努力想成为“平民主义者”或至少不与之为敌。这和古代有很大的不同。在古代,稍微有些文化知识的人都很欣赏精英,或者说渴望成为精英,所谓“希圣希贤”。那时候也不忌讳说自己。

是精英,羡慕精英或者渴望成为精英。但是,在今天弥漫的一种气氛里,谁都怕说自已是“精英”,别人要是把“精英”的帽子戴在自己的头上,马上就否认,唯恐避之不及。

经过百年来的演变,精英意识和民粹观念表面上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但骨子里有没有根本改变还很难说。比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人批王朔是痞子,太俗,太平民化,后来王朔却批起金庸、港台文化和雪村太庸俗或媚俗来。雪村是一个歌手,他父亲是一个少将,但他把自己打扮得比平民还平民,挎一个黄书包,骑一辆破自行车,是要积极地表现自己没有任何精英的血统,没有任何精英的特殊身份,比老百姓还老百姓,比底层还底层,但骨子里还是精英一个。我们很多情况下其实都是

慎重对待精英与民粹

“民粹”为表,“精英”为里。

我们经常处在精英与平民的困惑之中。比方说薛涌,最近他有一本书叫《草根才是主流》,他一直非常强调美国社会政治的民主性质和平民性质,但另一方面,他又承认即便在美国实际上也主要是精英在打理。他还有两本书《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和《精英的阶梯:美国教育考查》,其中谈到美国社会和教育是如何培养精英的。如果不是自己,也要让自己的孩子出众,这也是人之常情。

谈到“主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今天肯定不会赞成“精英主义”,但是难道要赞成“民粹主义”?或者还是讲“精英和大众”的关系比较客观一点。这两者的新关系在近代特别突出。在古代,在某种意义上,精英和大众是拉开距离的,一般来说,大家都知道大众就是大众,精英就是精英,多数就是多数,少数就是少数。从孔子一直到梁漱溟都非常明确,永远有这么一个差别,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但到了近代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要求精英和大众结合、打

成一片。但一旦谈到这两者的结合,矛盾就凸现出来了,因为结合有多种方式,也不排除有一种结合是以多数人为号召,甚至为幌子,实际上是一种更厉害的“统治”。

今天,作为政治家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大概谁都要顺应民意。而作为知识分子如何去处理?可以看看王小波的态度,他很平民,其实他也很精英。在文化的深处他有一种孤独,追求优秀和卓越;但另一方面,他也很大众,肯定不会想干预别人的生活,赞成让老百姓过好、吃好和穿好。私人领域归私人领域,公共领域归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他可以寻求一种共识、一种宽容、一种多元,但在私人领域,他绝对执著和优雅,认为人不能像物件一样活着,至少他不能如此活着,一定要有另外一些精神性的東西,只是不要以精神的东西压制老百姓或者压制多数。当然,今天的知识分子本来就已经边缘化,本就是一个介乎平民,需要想清和理顺的主要是一个安己亦安人的态度问题。

我倾向于还是把“精

英”看作一个比较客观的事实性描述,一个基本的标准就是能力比较出众而不以道德或政治画线,比如正统的曾国藩和反叛的洪秀全都是精英。过去真正的精英社会可能不用“精英”这个词,而用另外的词,比如用“君子”、“士大夫”、“圣贤”。现在我们换了词,并且今天成为精英的一个好办法就是标榜自己是民粹。当然这里面有一个数量上的标志,精英肯定是少数,这个数量标志也是一个中性的和客观的标准,没有道德上的褒贬含义。人多了就不出众了,没有说精英是多数的,说了也是假话。在众人中很安全,但也无法出类拔萃。

按照这种分类,也许还可以在少数精英里面分成思想或者观念的精英和行动的精英这两大类。思想的精英自古就有宗教先知、哲学家、艺术家三大类,到了现在则要加上更为突出的科学家。他们都是观念和思想上的精英,不太直接影响大众,要经过中介和时间,通过行动精英来影响多数和社会。我们现在都崇拜爱因

斯坦,但有多少人看得懂爱因斯坦写的文章?行动精英自古就有军事家、政治家,还有宗教领袖,近代以来还要加上相当突出的商人、企业家,比如比尔·盖茨,富可敌国。观念精英和行动精英这两类人是很不同的。以前我们太注意意识形态的分类,其实这两种人很值得分析。

关于超越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说法,我颇表赞同,主观上应当如此,但这两种东西可能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有一个平衡的问题。尽管我们自己不会站在某个极端,但某些时候更欣赏或宽容哪个极端则可以考虑如何大致达到一种平衡,还需要仔细分析实质。比如,在网络上众声喧哗自然很好,但有的人还没有看完对方的东西就已经破口大骂,甚至辱骂变成汹涌的浪潮。如果这种辱骂变成一种主流民意的话,就有点可怕了。现在都说到要重视网络的民意,其实这里面还要分析,到底有多少人真正能上网,发表激烈意见的人真的是多数,真的是代表民意吗?所以,我觉得要谨慎对待这个问题,永远不要去禁止人们发表意见,但是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

(何怀宏 来源:《社会学家茶座》)

[一家之言]

几多诗词被误读

很多古典诗词,已成为公众耳熟能详的语句。其实,随着现代生活远离古代社会,诸多常识性的文字也日渐生疏,难免后世生吞活剥,以讹传讹。现举几个例子,便可见一斑。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床,不是卧榻的意思,而作“井栏”解。

《辞海》里明确注释,床是“井上围栏”。李白此诗作于唐开元十五年,古人把“有井水处”称为故乡。诗人置身在秋夜明月下的井边上,举头遥望,顿生思乡之情。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船,不是船只,而是“衣襟”的意思。

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写了当时八位著名的诗人,其中一段专门写李白的醉态。据说,唐玄宗想召见诗仙,李白仍然保持一副很牛气的高人派头。所谓“不上船”,并非不登龙舟,而是敞开衣襟,连扣子都不系。《康熙字典》里明确记载:“衣领曰船”,“或言衣襟为船”。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落霞”,不是云霞的意思,而是指“零散的飞蛾”。

要了解这句话的意义,当时的风物不可不晓。对此,宋代吴曾说:“落霞非云霞之霞,盖南昌秋间有一种飞蛾,若今所在麦蛾是也。当七八月间,皆纷纷堕于江中,不究自所来,江鱼每食之,土人谓之霞,故勃取以配鹜耳。”由此看来,“霞”不是云霞,而是一种飞蛾。另外,“落霞”之“落”并不是“飘落”的意思,“落”在句中与“孤”相对,意思当相同或相近,是“散落、零散”之义。

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

屋漏,不是屋子漏雨,而是一个方位名词——屋西北角。

杜甫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其中“屋漏”二字历来被解释为屋子漏雨。“屋漏”其实是一个名词,它是屋内西北角的特定名称。《辞源》修订本“屋漏”条的第一个义项是:“房子的西北角。古人设床在屋的北窗旁,因西北角上开有天窗,日光由此照射入室,故称屋漏。”(来源:青年博览)

写史热中的学术荒寂

读史热一阵热闹后似已偃旗息鼓,而写家们却欲罢不能,从远古翻搅到民国。他们的“新写史”包装俗艳,在书店里面占据重点书架。

这类书包装相似,遣词造句也仿佛同出一个师门。他们不大读原著,从网络上搜索第N手错讹百出的材料,连缀成篇,据说高产者跟港台写报刊武侠连载相似,一天产出万言以上。

真正的历史学家对基础的功夫要求极高。吕思勉先生认为行远自迩,登高自卑,打基础的功夫不能省略。吕先生在《为学十六法》中谈到过这样的事:学术界的一些不学之人,喜撑门面,于是就罗列书名,以多为贵。但是从背后的细节就能看出他们的陋迹。

今之写史热的写手,有一些人一样是硬撑门面,其人对人物、制度以及历史机杼的转换,懵懂无明,却敢下笔万言,看似侃侃而谈、指挥裕如,实则似是而非、隔靴搔痒。对时局之纷纭错综,略无整合包举的功夫,任由笔下支离破碎,错漏百出。在他们的笔下,通常的功用、学术的积累,全不相干。

其二三十万字的文本,始终是毫无历史纵深感的平面文字,较之民国史家写史的沁人心脾,如老米煮饭捏不成团,他们依托一种万金油式的评论来“救市”,来抒发他们的“感慨”,一望而知是塑料花,绝非真香活色。其后果,造成一种信息的模糊,历史真相,反而无法识别。(来源:文摘报)

破解《乌拉尼亚》之谜

——读“诺奖”得主勒克莱齐奥新作

国,那里的人们生活在公平的法律之下,享有政治和信仰的自由,没有私有财产,却生活得富足、安乐、健康,合乎道德。莫尔以这部作品对当时英国社会“羊吃人”的现象给予了猛烈的抨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勒克莱齐奥的小说《乌拉尼亚》显然是对莫尔之梦的一次现代呼应。在《致中国读者》的短信中,勒克莱齐奥对小说的主题作了直截的说明,承认他的作品是一部现代版的《乌托邦》,作者希望借此复活那曾经帮助他和亲人们度过艰难岁月的幻梦。

《乌拉尼亚》以一位法国地理学家的经历作为线索,以旅行者的口吻切入“坎波斯”这个仿佛游离于时间之外的小镇生活。坎波斯的居民来自世界各地,大多身遭不幸,期望在新的居住地得到改变命运的机会。他们在老“参事”贾迪的指点下,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人的天性得到了充分的舒展,不用为算计和阴谋而学习,只要学习生活、学习“遗忘”就行,因为“遗忘”可以帮助他们恢复儿时的记忆,重新获得生活的能力,给他们带来自由和真理。作为一部寓言小说,坎波斯的居民应该是人类本身的象征。有意思的是其中出现了所谓的“人类学家”和“研究中心”,他们“在浓厚的殖民地氛围中举办各种会议并教授课程”,让“人类学毫无争议地成为人文科学中的皇后”,以“公平”“合理”的方式对周边的居民们进行了挤压和欺诈,利用科学来满足他们的权力追求,以机械的手臂打破了这个世外桃源的平静生活。最后,坎波斯

的居民被迫迁移,再度寻找他们的理想国。

在一部短篇小说集的序言中,勒克莱齐奥针对文学的边缘化表述过这样的艺术观:“诗歌和长短篇小说现在成了稀奇古董,它们不能,或者说几乎不能再哄骗人了。那为什么还要写诗歌和故事呢?写作,仅仅就是写作罢了。写作,就是用词语进行探索,深入细致地研究并描绘,紧紧抓住词语,毫不通融地刻画现实。”

对词语的敏感,是每个杰出的诗人和作家都具有的禀赋,勒克莱齐奥也不例外。在《乌拉尼亚》中,我们轻易就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他形容来自广场的各种汽车发出的噪音:“汽车的大轮胎在滚动的沥青上擦出的嘎吱声,柴油味,呛人的尘土味,那隆隆声中还夹着一种低沉的跳动声,一种持续不断的突突声,时而远,时而近,一下接一下,如同一只将广场和市中心楼房紧紧裹住的,身体奇长、内脏跳动的动物。”又比如他对红灯区妓女的描写:“咖啡座的尽头,在声嘶力竭的自动点唱机旁边,姑娘们像一串洋葱似的坐在塑料椅上。”“她们的嘴巴很大很红,眼眶是两团黑斑,这便构成了她们脸部的轮廓。”寥寥数语,就把那些沦落风尘的不幸女子的形貌音容刻画了出来。此外,作品中还有不少优美如诗的片断,让读者在领略了他娴熟的语言技巧之后,对他内心的细腻、纤柔、温润拥有了深切的感受。

在成名作《诉讼笔录》中,勒克莱齐奥声称,在小说创作中,存在着“广袤的处女地”需要勘察,“那就是作者

和读者之间相隔的辽阔的冰冻区”。“这种勘察应借助于从幽默到幼稚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感应,而不应该借用准确的叙述者与听话者之间有着一个信赖感逐渐明确、成形的时刻。这一时刻也许就是‘主动式’小说的关键时刻,此类小说的基本要素是某种逼迫感。在这一时刻,文本以淡淡的轶事和通俗色彩发生作用。”为了营造这样的效果,他在《乌拉尼亚》一书的章节设置和过渡上也颇具匠心,其中不少章节的题目便是上一章节某个句子遗留的一个单词或词组,作者或许是希望以此建立它们相互间的联系,在连贯的语气中自然地伸出枝权,却保持着故事的完整性。

就《乌拉尼亚》这部小说来看,作者肯定受到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这不仅因为他把故事的背景放在了墨西哥,而且更在于他在叙事上所表现出的对非理性和神奇性元素的揉捏。如果不曾意识到作者的法语背景,它更像出自拉美小说家之手。

毋庸讳言,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在百年来的评选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显示着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但获奖者勒克莱齐奥本人却是一个有着世界主义心胸和视野的作家。他对西方文化的批评在于,他认为,“西方文化已经变得过于铁板一块。”“西方文化过于突出其城市性、技术性,妨碍了其他表现形式,如地方性、情感性的发展。人类的整个不可知的部分被理性所掩盖了。正是这种认识促使我转向其他文明。”实际上,勒克莱齐奥的“转向”是与上世纪60年代初的“新写史”浪潮有关的。

记得王尔德说过,一张没

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它缺少了人类终要落脚的地方。勒克莱齐奥的小说给了我们同样的启示。生活或许是一场悲剧,但在绝望的杯底潜伏着希望。精神并非虚无的存在,它的美丽是值得永远追求的目标。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乌拉尼亚”,我们整个生命都将

是与上世纪60年代初的“新写史”浪潮有关的。

记得王尔德说过,一张没

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没有

价值的,因为它缺少了人类

终要落脚的地方。勒克莱齐奥的小说给了我们同样的启示。

生活或许是一场悲剧,但在绝望

的杯底潜伏着希望。精神并非

虚无的存在,它的美丽是值得

永远追求的目标。每个人都会

有自己的“乌拉尼亚”,我们

整个生命都将

是与上世纪60年代初的“新写史”浪潮有关的。

记得王尔德说过,一张没

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没有

价值的,因为它缺少了人类

终要落脚的地方。勒克莱齐奥的小说给了我们同样的启示。

生活或许是一场悲剧,但在绝望

的杯底潜伏着希望。精神并非

虚无的存在,它的美丽是值得

永远追求的目标。每个人都会

有自己的“乌拉尼亚”,我们

整个生命都将

是与上世纪60年代初的“新写史”浪潮有关的。

记得王尔德说过,一张没

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没有

价值的,因为它缺少了人类

终要落脚的地方。勒克莱齐奥的小说给了我们同样的启示。

生活或许是一场悲剧,但在绝望

的杯底潜伏着希望。精神并非

虚无的存在,它的美丽是值得

永远追求的目标。每个人都会

有自己的“乌拉尼亚”,我们

整个生命都将

是与上世纪60年代初的“新写史”浪潮有关的。

记得王尔德说过,一张没

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没有

价值的,因为它缺少了人类

终要落脚的地方。勒克莱齐奥的小说给了我们同样的启示。

生活或许是一场悲剧,但在绝望

的杯底潜伏着希望。精神并非

虚无的存在,它的美丽是值得

永远追求的目标。每个人都会

有自己的“乌拉尼亚”,我们

整个生命都将

是与上世纪60年代初的“新写史”浪潮有关的。

记得王尔德说过,一张没

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没有

价值的,因为它缺少了人类

终要落脚的地方。勒克莱齐奥的小说给了我们同样的启示。

生活或许是一场悲剧,但在绝望

的杯底潜伏着希望。精神并非

虚无的存在,它的美丽是值得

永远追求的目标。每个人都会

有自己的“乌拉尼亚”,我们

整个生命都将

是与上世纪60年代初的“新写史”浪潮有关的。

记得王尔德说过,一张没

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没有

价值的,因为它缺少了人类

终要落脚的地方。勒克莱齐奥的小说给了我们同样的启示。

生活或许是一场悲剧,但在绝望

的杯底潜伏着希望。精神并非

虚无的存在,它的美丽是值得

永远追求的目标。每个人都会

有自己的“乌拉尼亚”,我们